

原道

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阐释

沈斐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阐释不仅是理论传播,更是党的形象传播、价值理念传播和身边故事讲述。要善用“先锋队”的鲜明形象、民主集中制的鲜活道理和基层民主的生动实践,讲好中国共产党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故事。

用“先锋队”的鲜明形象,讲清党的领导、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一词,可译为vanguard,取其“先头部队、前卫、尖兵”之意,也可译为pioneer,取其“领路人、先驱者、探路者”形象。

党的领导是统领与主线。《说文》认为:“道,所行道也。从辵,首。”“首”字为人头形象,“道”即走,走路离不开“头”,意即跟着前方首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从其“领路人”的作用和地位中派生而来的领导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把党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制度程序和治理机制贯穿到国家政治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党内民主是示范与带动。毛泽东曾生动地运用“向导”一词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的“领路人”形象:“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错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领路人”形象不同于西方政党的“代言人”。“代言人”是选民的喉舌,代表的是部分人的主张与利益;“领路人”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不仅代表选民,而且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路人”,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领路人”的主张变为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组织和党员肩负着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人民民主是机体与生命。在中国,党内民主先于、高于人民民主,但又必须依存于、扎根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示范并带动人民民主,但又必须与人民民主协调互动,最终达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均衡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党内民主的发展水平、高于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但同时也需要从人民民主中吸收智慧和有益成分。例如,1979

用民主集中制的鲜活道理,讲透中西方民主的不同价值理念

一支由“先锋队”带领的大部队,必须常喊看齐、保持队形,因而在行进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最优组织原则。这一制度把充分发扬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既最大限度激发创造活力,形成集体智慧,保证队伍正确的行进方向和战略策略;又统一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从而形成联合、团结、凝聚的雁阵式队伍。

是联合、团结、凝聚,还是分隔、分裂、分散,这是“先锋队”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重要标识。西方民主建立在原子式个人的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分隔、分裂、分散为特征;不同的利益集团抱团取暖,形成不同的政党。为保护分隔、分裂、分散的原子式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资产阶级设计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体系。而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天父地母”“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把全人类视为一个大家庭,联合、团结、凝聚是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复兴之路、人民富强之路,其必然结果是,在国内倡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际上倡议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民至上,还是选民至上,这是“先锋队”区别于西方政党的又一重要标识。西方民主表面上也赞成“人民至上”,赞成“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是“选民当家作主”。而选民被分解为原子式个人,一盘散沙,根

本无力表达政治权力,只能听凭资本摆布。而“先锋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尊重与弘扬人民意志,充分实现人民利益,通过选举与协商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每一个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实践的各个环节,充分参与国家治理。

是坚定向前,还是走到哪算哪,这是“先锋队”区别于西方政党的第三个重要标识。西方政党没有方向,而是根据群众的投票,走到哪算哪。这种政党,相当于一个以契约方式搭建的临时集体,在无限期博弈和零和游戏过程中形成一种“争权啥就啥样,有机会再争下去”的机制。而“先锋队”必须具备坚定的方向感,才不会误入歧途。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最低纲领,但最高纲领始终不变。通过十四个“五年规划”,党带领人民朝向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目标稳步前进。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且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国体和政体。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各项法规制度,以及国家机构和人民团体的各项法规制度,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建立和形成的,都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

用基层民主的生动实践,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只有投票的

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以浙江在市县乡层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为例,可以更准确深入地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

最广泛。该项目的核心理念在于“还权于民”,实现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变。其准备工作在每年9月、10月启动,由政府办公室牵头,通过互联网、公众号等渠道议题、海选式征集,经“几上几下”,把群众真正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反映上来,优先办理“急难愁盼”。项目的征集和筛选由全民参与,实施项目由代表票决确定,实施过程由代表跟踪监督、完成结果由代表民意评议,最大程度地汇集民意、表达民意、实现民意。

最真实。“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该项目抓住群众关切的“关键小事”,使民生实事项目由原先“政府部门自己定自己办”转变为“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人大评”,实现人大集中决定、政府决策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真正把人民群众所需、所盼、所忧之事办实办好。同时,巧妙将民生实事项目的选定、决议、监督、评价等诸多环节引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群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共事务提供制度载体和可行路径。

最管用。该项目以人大行使决定权的方式赋予民生实事项目以法定效力。经过人大票决的项目,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一般为本年度)实施到位。这一制度设计,既有国家权力机关实行票决民主的内涵,又兼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把票决结果的刚性与协商过程的柔性很好结合,是民主集中制在为民办实长效机制上的成功运用,充分表达了民情民意,实现了多元利益的权衡和整合。

近年,像这样发端于基层首创的生动实践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比如基层立法联系点、民意直通车、代表联络站全覆盖、代表问政机制常态化、召开街道居民议事会等,涌现出一批具有标识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金名片”。讲好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项目,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阐释,更能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党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怎么看消费贡献率超七成

胡晓鹏

短期来看,要认可消费贡献率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积极效果。长期来看,要提高投资贡献率水平,要格外注意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扩张的持久性,也要格外注意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联动关系。

根据2023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2.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53.9%,有效发挥出优化供给结构作用。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容构成方面,相对于净出口,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两大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内循环的两大经济活动类型。从实现机制上讲,消费是通过需求扩张带动的生产规模扩张,投资则是通过产能提高实现的生产规模扩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才能够实现消费增长。相对而言,投资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可控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预期决定投资规模,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投资规模。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困难时,政府启动的公共投资以及对企业投资预期的引导,就变得非常重要。从经济增长持续性角度来看,消费和投资作为驱动经济增长国内需求的两个“轮子”,彼此之间应当保持协调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实现的国民经济增长,才符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要求。

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内循环

要想辨析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到底孰优孰劣,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实践中GDP统计时生产法和支出法的核算思路,进而了解消费贡献和投资贡献所代表的现实意义。一般而言,生产法是最常用的核算方法,它是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实现增值的部分进行加总而得。这种方法可以从供给侧角度了解各行业生产情况,发现究竟是哪些生产要素带来了更多的增加值。支出法是对国民经济生产成果最终使用去向的计算加总,包含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可以从需求侧角度了解生产成果的销售去向,有利于从宏观上确定并引导未来国民经济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出口品和内销品的比例关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成果完成的交易总量中,有近80%是被国内居民消化的最终消费品,这是我国近年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的成果体现,初步形成了以消费主导的内循环格局。

消费拉动与投资拉动辨析

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对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更好呢?在笔者看来,一国经济增长到底应该由什么力量拉动,是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形态,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60%以上的水平,这和发达国家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通常来说,一国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后将出现三个变化特点:一是因服务业效率提升缓慢,个人收入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但上升速度却会非常缓慢;二是因制造业比例已经很低,而国内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已经高度完善,所以国家没有大规模投资的空间余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递减;三是因商务成本提高导致制造生产能力不断外移,国家对货物进口依赖度迅速提高,加之服务贸易规模小于制造业货物贸易,净出口贸易逆差将成为常态。此时,维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最终消费。要保证消费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就必须确保居民消费能力的稳定。那么,居民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消费金融创新,这就是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通过掌控国际分工获得更多增加值与收入溢出,以及使用本国强势货币向全世界征收通胀税等,也是维持本国消费稳定与扩张的常用方法。

对于制造经济为主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投资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投资可以实现资本总量规模的扩张,物化资本增加可以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投资还具有调节结构、促转型的作用,尤其是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可以有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的这两大效果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另外,投资也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机器设备等生产成果的一种消费,它可以和最终消费一样驱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服务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是短期的数值大小,更在于投资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以及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升级。

从我国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5.5%的增速传递出中国经济宏观面基本稳健的信号。短期来看,要认可消费贡献率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消费扩张无疑是支撑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重要动力。长期来看,要努力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在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和增长的前提下,提高投资贡献率水平,要格外注意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扩张的持久性,也要格外注意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联动关系。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面的支持,加快恢复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改变投资贡献率偏低的情况。(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实效性

张亦珂

作为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世界民主话语体系的创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理应得到有效广泛的国际传播。

由新话语演变为动态历史概念

“民主”概念进入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概念翻译、理论介绍再到传播对象接纳的漫长历程。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开始接触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当时美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刊发译文,介绍西式民主。Democracy的翻译最初利用了中国古语典籍中已有的“民主”二字,没有进行音译,是译者有意为之,其目的是构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德莫克拉西”即“德先生”的音译名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才出现。伴随这些新概念引入,西方议会制度、民主思想也逐步为人所知。

对这些概念和思想的介绍和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其绝对接受。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评价法国政局与民主制度时表示“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大器,为弊甚大”;早期维新派代表薛福成比较君主制与民主制时议论道:“民主、君主,皆有利害即有弊。”需要指出的是,身处中西政治连接地带的早期外交官、洋务人员以及知识分子是西式民主在华传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儒家思维评鉴西方政治思想,客观上扩大了传统政治文化思维及词汇的包容性。当社会变革契机出现,诸如“民主”一类的新话语演变为动态历史概念,广大受众对新话语的接纳也会从思想批判走向情感共鸣。

培育关键受众 区分第一受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应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此传播过程是从理论阐释到叙事呈现的多方参与式实践,其传播对象即受众群体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传播策略的成败。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培育关键受众。西方主流媒体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创新采取回避、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因此,对外传播的媒介路径和方式一方面需要做大做强我国主导的国际传播平台,另一方面需要用数字话语平台的拓展和数字媒体等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比“受众”更为具体的“关键受众”即关键性意见领袖扮演重要角色。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之治 篆刻:李建成

论是对话和沟通,还是批判和反思,关键受众能够将新话语转换为分众化表达,具有影响他人态度、使个人经验变为群体经验的能力。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对外阐释需要关键受众协同解构西方民主的话语旧体系,塑造世界民主政治话语新秩序。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区分第一受众。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一方面,西方国家治理乱象丛生,美国深陷政治极化、政党恶斗之中。当代西式民主为资本裹挟,日益暴露弊端。与此同时,民众对西式民主运作方式的不满导致产生政治变革的愿望。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7个发达经济体里,有56%的人表示本国政治制度需要重大变革或需要彻底改革。可见发达国家民众普遍对当代西式民主的制度与实践感到焦虑。

另一方面,中国在双边关系、地区合作和全球层面积极倡议并推动打造多种样态的命运共同体,既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架构,也搭建起文明对话、政党交流、民间外交等互学互鉴平台。这些努力结出丰硕成果,中国在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受欢迎程度远高于西方国家。英国民调机构YouGov在2022年8月至9月间针对25国2.5万人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非洲国家民众近年对好感度显著提升。

更多的全球调查数据也表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把中国视为真诚、友好、可靠的朋友。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体系的欺骗性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危害性。

宏阔的时代之变不失为中国理念传递的契机。受众的情绪反应、感觉以及情感动态能够塑造国际政治舆论场的进程及结果。对华好感度比较高的群体,对美国民主持怀疑态度的群体,对本国民主不自信的群体,抗拒西方民主话语叙事的群体,都应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民主”的第一受众,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全新的非西方的民主话语叙事形态,推翻了西方民主的“唯一性”假设,主张人类民主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把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上升到战略传播高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播需要贴近受众需求。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不再作为单一主体进行传播,国际话语权斗争只会更加激烈。从技术的正面影响看,传播主体更加容易了解受众偏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在制度安排还是实践逻辑上,尤其注重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参与立法渠道的问题。如何为弱势群体赋

权、赋能的鲜活案例应被纳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传播的议题视野中,有助于传播对象深入了解民主的中国方案,有助于传播主体掌握话语主动权。但是,从技术的负面影响看,第一,受众长期被智能媒体推荐算法支配,更容易造成信息茧房、知识结构单一和信息偏见等现象。第二,受众无法甄别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虚假信息。例如通过换脸、口型同步、图像与音频生成、文字生成等方式可以歪曲真相、篡改事实。第三,受众更容易被操控和文化霸权。人工智能可以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文化传播、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寻找利益共同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对意识形态进行再加工,引导舆论场中“沉默的大多数”。因此,除了打好传播技术战之外,还需要把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上升到战略传播高度,整合一切传播资源,通过赋予受众更多话语权和发言权,抓住受众的兴趣、重塑受众的角色;通过线上线下分享体验,满足受众的需求,重构受众的认知。

理念的传播从来不一蹴而就的。受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观念转变和观点接纳。传播主体应当认识到传播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胸怀斗争精神,坚持不懈,才能在话语体系之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